

陝西歷史博物館叢書



西安碑林

李城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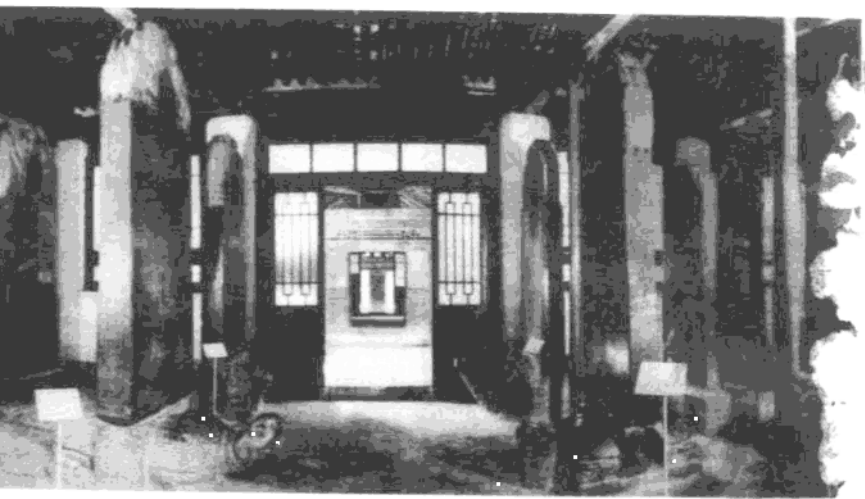
陕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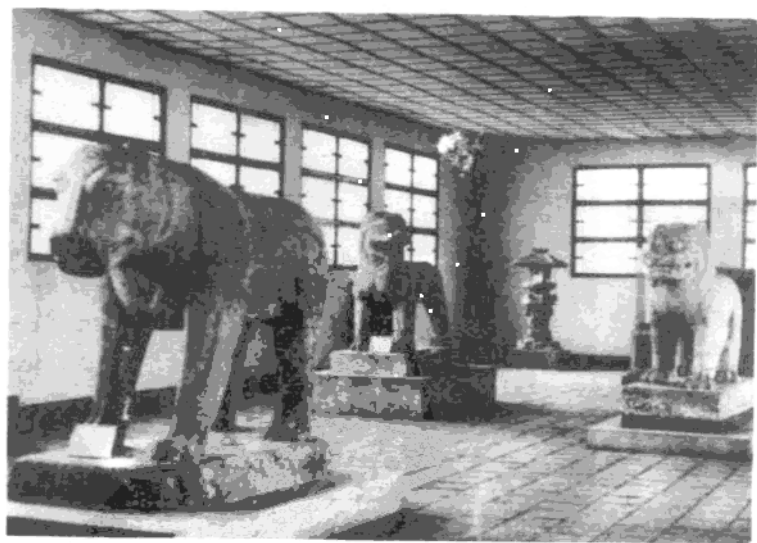
1. 西安碑林保护标志



2. 《石台孝经》碑亭



3. 碑林第三展室内景



4. 石刻馆内厅一角

说 明

西安碑林创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一〇八七年），经历代不断扩大，截止目前，共收入碑碣、刻石达两千余方。其中已展出一千余方，分别布置在八座碑亭、七个展室和八个游廊中。它是我国集中保存汉唐以来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和数量最多的地方。一九六一年三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从西安碑林保存的大量丰碑巨石，不仅可以了解我国书法艺术发展演变的梗概，而且不少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碑文、墓志、塔铭、经幢，以及雕刻精湛、丰富多采的碑石、墓志边侧花纹和浮雕、造象、石刻线画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雕刻艺术的宝贵资料。为了帮助广大群众了解碑林，更好地参观游览碑林，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在这本小册子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博物馆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何正璜同志在百忙中还对此书的若干章节作了详细校审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目 录

- 一、西安碑林的建置……………(1)
- 二、我国完整的石刻经书馆……………(8)
- 三、珍贵的古代书法艺术宝库……………(15)
- 四、丰富多采的历代墓志……………(39)
- 五、塔铭、经幢、造象碑……………(53)
- 六、东汉画像石……………(71)
- 七、精湛的雕刻造型艺术……………(80)
- 八、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101)

2089

一、西安碑林的建置

西安碑林位于西安市三学街。早年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狭窄，又经常有人墨拓，碑石发黑，曾被称为“墨洞”、“碑洞”；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三年）《重修碑亭记》中把保存碑石的房屋称作“碑亭”或“碑楼”；嘉庆十年（公元一八〇六年）《重修西安碑林记碑》中始有“碑林”之称。

碑林的建置，可追溯到唐末、五代及北宋时期，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最初原是为保存唐代刻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而建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内。唐昭宗天祐元年（公元九〇四年）朱全忠叛乱，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并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后来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便于防守，将唐长安城缩小。在原皇城的基础上改筑新长安城时，鉴于务本坊被划在城外，为使许多重要碑石如《石台孝经》等不至散失，便将它们迁至城内，加以保护。碑林现存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九六二年）立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说：“天祐甲子岁，太尉许国□公才务修葺，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这是关于石经迁移最早的记载。许国□公，应为许国韩公，

即韩建。迁移的地方是宋代的文庙，即唐皇城尚书省的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一带。碑文说，韩建在唐末缩小长安城的同年（天祐元年）即迁移了石经。后人研究认为，韩建这次迁移的只是两种石经中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的迁移要晚几年。碑林现存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一〇九〇年）《京兆府新移石经记碑》说：“（石经）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修新城，而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朱梁时刘鄩守长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请辇入城……乃迁置于此，即唐尚书省之西南隅也。”据此知，刘鄩这次迁的是“六经石本”，亦即《开成石经》，时间约在韩建迁《石台孝经》后四至五年。

到了宋代，为了进一步保护这些碑刻，在漕运使吕大忠等人的倡议下，遂将全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移置于府学北面（即碑林现址）。这次移动，由于准备工作做得较好，选择的地方地势干燥，地基坚固，又修建了放置碑石的屋舍、亭、廊等，安排了陈列次序，使碑石得到了较为妥善的保护，为西安碑林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金、元两代，对碑林屋宇曾作过修葺，但关于碑石本身，无记载可考。

明宪宗成化九年（公元一四七三年）马文升重修过西安碑林。到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冬十二月（公元一五五六年），关中发生大地震时，碑林中许多碑石被震坏。其中《开成石经》就有四十方被震裂。其他碑石如《多宝塔碑》、《玄秘塔碑》、《皇甫诞碑》、《不空和尚

碑》、《孔子庙堂碑》、《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碑》、《三坟记碑》、《栖先莹记碑》等，也都倾倒折断。明赵子崧著的《石墨镌华》中记载说：“嘉靖乙卯（公元一五五六年）地震，石经倒损，西安府学生员王尧典等，按旧文集其缺字，别刻小石立于碑旁，以便摹补。”今查看碑林中确有《开成石经》补字石九十七方。明万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年）所立《重修孔庙石经记》又说：“岁月既久，印摹者多，渐有磨灭不可读之疵。”因而，“凡点画失真者正之，苔藓污者新之，泐而欹者理之，文义断阙者借群书补之。”这证明当时对碑石又进行了一次整理。

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年），陕西巡抚贾汉复补刻《孟子》一书碑石共九方。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麻尔图又刻《大学》、《中庸》碑石共二方。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〇年），对碑林又进行了一次修缮，碑林现存的《重修碑亭记》，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公元一七八一年），陕西巡抚毕沅再度对碑林作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毕沅是对西安碑林建设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在他所著的《关中金石记》中说：“内外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者，编排甲乙，周以栏楯；明代及近人所刻，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清嘉庆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又有过两次整修。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邵力子等又对碑林进行了一次规模比明清期间大的整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整修西安碑林工程监修委员会。全部工程请北平建筑学社梁思成设计。主要项目是对碑林的房屋全部翻修，并建立了一座新的陈列室（即今碑林六室），又在各陈列室之间修建了陈列墓志的走廊，同时又修建了大门、储藏室、休息室、办公室，以及碑亭两座。工程的施工方法，是对原有陈列室的地基以三合土夯实，先立碑，后盖房，使原来埋在地下的碑座全部露出地面；取消了原十三经陈列室后边的“碑洞”，将站立在石台孝经两边的颜、柳等唐碑分别置于二、三室；又把《孟子》、《中庸》、《大学》等碑移入开成石经室内东边。对《开成石经》，除进行详审校正外，还对其陈列形式作了一次较大的改变：首先是去掉全部碑额，换成水泥做的平板式的顶盖；碑的前后上端完全用钢板夹束；凡碑身断裂处进行补固；在每隔二碑、三碑或六碑中间，加以水泥柱子；柱子的前后设计有装饰性的牙子，平列而立，好似屏风相连。但这种做法的不足之处是严重地破坏了石经的原貌。一九三九年，曾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并被誉为现代书法大师的于右任，将他一九二四年从洛阳古董商手中买到的包括汉、晋、北魏、北齐、北周及隋、唐等各代的碑、志二百九十余方，统称为“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给西安碑林。所谓“鸳鸯七志斋”，实系以于右任捐赠的北魏七对夫妇墓志而得名，即《元珽及其妻穆玉容墓

志》；《穆亮及其妻尉太妃墓志》；《元诱及其妻冯氏和薛伯发墓志》；《元遥及其妻梁氏墓志》；《元谭及其妻司马氏墓志》；《赫连子悦及其妻阎炫墓志》；《李挺及其妻刘幼妃墓志》。一九四八年又陆续移入原新城内“小碑林”存放的《颜勤礼碑》、《慧坚禅师碑》、《武都太守残石》、《美原神泉诗序碑》、《述圣颂碑》等，丰富了碑林的藏品内容。当时这些碑志由于缺乏妥善管理，碑室内多阴暗潮湿，蛛网、鼠窝、鸟巢遍布，粪土处处；院中破砖碎瓦，杂草丛生，呈现一片荒凉景象。

一九四九年西安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古老碑林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并有了迅速发展。一九五三年，西北文化部将碑林和文庙合并成立了陕西省博物馆，碑林成为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六一年三月，国务院公布西安碑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在文物部门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紧密配合下，又陆续发掘清理出各代重要碑石和墓志三百余方，其中著名的有魏《正始石经》残石；晋《司马芳碑》；隋《尼那提墓志》、《罗达墓志》；唐《郭荣碑》、《李愬碑》、《道德寺碑》、《李夷简碑》、《李寿墓志》等等。在全省多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上，从各地还陆续新移入碑林一批书法名碑，有汉《熹平石经》残石、《苍颉庙碑》、《仙人唐公房碑》、《曹全碑》；前秦《广武将军碑》；北魏《晖福寺碑》；唐《同州圣教序碑》、《臧怀恪碑》；北宋《折克行

碑》、《折继闵神道碑》和宋徽宗赵佶写的《大观圣作之碑》；还有近代名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杨松轩墓碑》、《耿直纪念碑》；冯玉祥书写的《朱子桥纪念碑》等等，极大地充实了碑林的内容。

根据党的文物保护方针，三十多年来，人民政府曾拨专款对碑林进行了多次整修。不断地翻新房屋，绿化环境，调整碑石，树立保护标志，建立文物档案，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撰写专著、论文，编辑出版碑帖，扩大宣传，使碑林更好地发挥了古为今用的作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七年，还将西安碑林的一些名碑拓片装裱，两次赴日本东京、奈良等地展出，深受日本书法爱好者和人民的欢迎，日本的考古界知名人士宫川寅雄先生，还把一九六五年的展出资料汇编成《西安碑林书道艺术》，精装成巨册出版发行。这不仅对促进中日两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起了巨大作用，也为我国悠久的书法艺术增添了光彩，扩大了影响。

为了加强对这批古代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一九七八年起，国家对碑林还采取了防震加固措施：不仅对碑林全部房屋梁柱进行了抗震加固，而且对陈列出的所有碑石，以室为单位，用角钢将每块碑石的碑头、碑身、碑座固定成一个整体，并铆固在地下。碑石之间也以角钢相连，以增强抗震能力。同时给主要碑石都安装了玻璃。现在的西安碑林，窗明石净，整齐美观。其中已收藏汉、晋、北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

及近代碑石、墓志、经幢、造象达二千三百余件。已展出一千多件，陈列面积一千九百六十四点三平方米，包括六座大型陈列室、八个墓志廊、两座碑墙和八个碑亭。从一九八一年起，碑林又开始施工新建第七陈列室。此室竣工以后，计划将近年来征集到的重要碑石，补充陈列到碑林中，和广大观众见面。那时，当人们进入碑林，可以看到更多的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精品，欣赏各种精美的艺术雕刻；可以借以研究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以及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二、我国完整的石刻经书馆

在西安碑林第一展室，陈列着我国历代精心保存下来的一部宏大、完整、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石质书籍——唐《开成石经》。要了解它的历史及内容情况，首先得了解一点我国文字及书籍的镌刻史。

我国文字及书籍镌刻有悠久的历史。甲骨文、钟鼎文是它的早期阶段；战国时期，铭文于石的现象开始出现，著名的《石鼓文》可为代表。《石鼓文》是在十个鼓形石头的周围，以篆书（大篆）镌刻的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故名“石鼓文”。《石鼓文》的文字书法继承了周代书体特点，雄强浑厚，朴茂自然，是一件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石鼓于唐初在陕西凤翔县发现，著名诗人韦应物、韩愈等作有《石鼓歌》以记其事。唐代书法评论家张怀瓘的《书断》中有“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的赞语。

其后，在秦始皇、秦二世时代，有《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都是在方形石头四面刻写的文字。据说这些刻石是秦丞相李斯用继大篆之后演变而成的另一种书体、即小篆体书写的。字体谨严

浑厚，平稳端凝，疏密匀称，一丝不苟。它的内容都是歌颂秦统一六国、进行种种建设的功德的。它与汉代以后以碑的形式传播儒家经典著作，目的截然不同。

到了汉代，由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学说被规定为正统思想，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儒家著作被封为“经典”，广为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刻写儒家经典于碑石上，以供人们阅读传抄的现象。不过这种石刻经书的活动，在唐以前仅有过三次。

最早要算西汉末年王莽令甄封刻的《五经石刻》了。但考古工作者直至目前尚未获得原物；其次是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刻的《熹平石经》，内容有《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仪礼》、《公羊传》、《论语》等，共刻成碑石四十六块，立在洛阳太学（当时的“国立大学”）里。据说这



图二·一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部石经为当时著名书法家蔡邕及其同僚们所书写，到光和六年（公元一八三年）才全部刻成的。

东汉末年，时势变乱，《熹平石经》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国内仅散存一些零碎残石。西安碑林藏有《熹平石经》中的《易经》残石一块，呈一斜方形残断面。残石高三十三厘米，宽五十六厘米，两面各刻《周易》一段，一面为“家人”至“归妹”十八卦，存二十七行，共二百四十六字；另一面为《文言》和《说卦》，存十一行，共一百零一字，为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的一块，向为考古、书法界所珍视。这块《熹平石经》残石出土后，为于右任所购得，后运往上海，曾以拓片影印。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一文中说“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余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数百字。吾辈眼福实过宋人，何其幸欤！”抗日战争期间，这块《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辗转运到陕西，解放后由富平送来，入藏西安碑林。初发现时，尚有四百九十余字，而今仅存三百四十七字，说明在辗转迁徙中有过残损。

汉末魏初，古文经学已很盛行，而《熹平石经》却全是今文经，所以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公元二〇四——二四九年），由张揖、韦、恒稽康等人书写，又刻了三种古文经。有《尚书》、《春秋》及《春秋左氏传》。书法一字三体，先古文，次篆书，再隶书，故

称“三体石经”，又叫“魏石经”。初立于洛阳魏故城南（今洛阳朱家圪塔、龙虎滩一带），到北齐高欢执政时，由洛阳徙邺都（今河南安阳北），行至河阳，因黄河岸崩，一部分石经沦陷河中。北周大象元年（公元五七九年），复由邺都迁回洛阳。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又从洛阳迁移到长安；唐初兵变时被废作柱础；贞观初年，魏徵搜集残石时，已十不存一，所以自宋以来，《三体石经》未闻有著录。直到清末民初，在洛阳才先后有《尚书·君奭》、《尚书·无逸·君奭》、《尚书·多士》几段残石出土。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

士庙街也出土了一块

“三体石经”残石，为《尚书·康诰》一段。一九五七年六月，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西段挖下水道时又发现了一块，此石为一不规则的正方形残石，一面上部刻《春秋》成公元年及二年记事残文，仅余十行共五十字，首行起自“无冰”二字，末行止



图二·二、《三体石经·尚书》残石

于“邾人”之“邾”字，下部空白。另一面刻《尚书·梓材》

篇，余十行，共四十一字，首行起自“予罔厉杀”之“罔”字，末行止于“欲至于万”之“欲”字，下部有“第十七石”四个大字（残缺）。右边有“始二年三”小字一行。由此可知，“三体石经”是正始二年三月刻的。在此以前还从未见对《三体石经》有具体年月的记载。这块刻石的发现，解决了《三体石经》镌刻年代的悬案。此石现收藏于西安碑林，是西安碑林藏石中的珍品之一。

碑林现存“石经”大部分刻于唐代。大和四年（公元八三〇年），唐文宗接受了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玠等人以楷书书写，刻制石经。从倡议到刻成大约花了七年（大和四年——开成二年）时间。因为石经全部刻成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故名之为《开成石经》。它的内容包括儒家经典著作《周易》、《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以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石经题名”，共一百一十四石。每石高约二百一十六厘米，宽约八十三至九十九厘米。文刻两面，计二百二十八面。每面刻八层，共五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石板排列如连嶂，可称洋洋大观！

这部石经刻成后，原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为当时封建知识分子必读必校的蓝本。北宋哲宗元祐五年